

對內開放，對外保護

● 韓德強

在關於中國入世的利弊和對策的討論中，經濟學界的主流聲音是所謂「加快改革，迎接入世」，韓朝華以〈以體制改革克服危機〉一文可以稱得上是這種聲音的一個系統表達。然而，拜讀全文後我卻感到，無論對於國際還是國內經濟的分析，作者都缺乏足夠的現實感，而一味沉浸於制度幻想中。

在關於中國入世的利弊和對策的討論中，經濟學界的主流聲音是所謂「加快改革，迎接入世」。其政策主張大體有：加速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加快國有中小型企業拍賣、租賃，加快國有大型企業的股份化並大大降低國有股份，重塑市場經濟的微观基礎，使每一個企業都成為真正自負盈虧的、有活力的市場經濟主體，在制度上實現與國際接軌。如此，則中國企業將以生產要素低成本的優勢迎接國際競爭的挑戰，使加入世貿組織成為中國發展的機遇。

貴刊今年6月號韓朝華〈以體制改革克服危機〉一文，可以稱得上是這種聲音的一個系統表達。然而，拜讀全文後我卻感到，無論對於國際還是國內經濟的分析，作者都缺乏足夠的現實感，而一味沉浸於制度幻想中。

一 制度改革是否足以迎接全球競爭？

與韓朝華的文章同時發表的還有英國劍橋大學專門研究國際競爭力的

學者諾蘭 (Peter Nolan) 的文章〈中國大型企業還將何以立足〉(《二十一世紀》，2000年6月號，總第59期)。從標題即可看出，諾蘭認為中國大型企業將難以應對入世後的全球競爭。其實，諾蘭的觀點已經是中國企業界和經濟學界的共識，並沒有多少爭議，連韓朝華也不反對。爭議在於，既然不具備國際競爭力，那麼面臨入世的挑戰，中國大型企業將何以自處？據韓朝華介紹，有人主張，為了培育國際化大企業，應當由政府出面以行政方式整合現有企業，待這些企業在競爭壓力較小的國內環境中成長起來之後再對外開放。韓朝華認為，由於國有企業還沒有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事主體，不能有效地、持續地推動技術進步和提高效率，因此僅靠行政干預組建大企業集團實現經濟趕超，無異於東施效顰。

這一分析並不乏道理，甚至可以說這是二十年改革的基本邏輯走向。問題在於，依靠制度變革，使大型企業成為產權私有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是否就能夠具備國際競爭力？韓朝華顯然對此充滿期待，甚至認為

「經濟全球化究竟是機遇還是挑戰，完全要取決於中國在制度、人才、技術、觀念等方面的狀態，取決於中國社會在這些方面的變革能力和創新能力」。然而按照諾蘭的分析，即使如此，中國的企業仍然不具備國際競爭力。因為競爭力並不僅僅取決於活力和動力，如同拳擊不僅取決於信心和勇氣一樣。但凡對市場競爭還有點感覺的人都應該知道，同是私有制企業，同處市場經濟中，資本、技術、品牌、管理、營銷網絡大小及強度各不相同，其結果也大相逕庭。有的是世界500強，有的則為500強的兒子、孫子、曾孫層的協作配套企業，也有的成為地區性市場的霸主，有的像在北京街頭等待僱用的木匠，有一單接一單零敲碎打地度日，有的則乾脆破產倒閉，負債累累。世界500強壟斷了世界經濟各主要部門，享有高額壟斷利潤，其總裁可享受上億美元的年薪和紅利，可乘坐私人噴氣式飛機，普通僱員到各地出差必須住五星級賓館。依靠高額壟斷利潤，這些企業可以用最高的薪水招攬到最出色的研究和工程人員，鞏固並增強其技術壟斷地位。依靠這些企業上交的稅收、設立的基金、捐助的善款，美國、歐洲、日本的大學可以有豪華的教學樓和先進的教學設施，有一流薪水的教授，可以給外國留學生發放獎學金，將世界其他各國教學體系層層篩選出來的科技精英吸收過來，為研究機構培養後備人才。甚至，依靠高額壟斷利潤，世界500強還能設立甚麼福特基金、亨利基金，收買各國的人文精英，為這些公司構築的全體生產分工體系大唱讚歌，而不顧本國企業的死活。

如果中國企業的體制改革是發生在兩百年以前，韓朝華的樂觀預見是完全有道理的。無論是鑽研科學技術，還是辦廠經商，中國人都並不比人差。問題是，今天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之初了，國際經濟競爭的海洋中已經形成了從浮游生物、蝦米小魚到鯊魚、鯨魚的龐大食物鏈。與食物鏈頂端的鯊魚、鯨魚型跨國公司相比，中國的企業無論是否有活力，充其量只能算黃魚、帶魚、金槍魚。在有保護的開放條件下，就如同渤海灣口築了一道鐵絲網，大洋裏的鯊魚進不來，黃魚相互競爭也許可以產生出鯊魚。一旦把鐵絲網完全撤除，很難設想黃魚不成為鯊魚的美餐佳餚。

二 全球化下的「制度競爭」 意味着甚麼？

韓朝華認為，國際競爭的實質在於制度競爭。甚麼叫制度競爭呢？韓文解釋說：「投資環境好的國家將成為優勢企業薈萃、經濟資源富集的增長『寶地』，而投資環境差的國家只能淪為國際市場中『被遺忘的角落』。」而所謂投資環境好，就是制度好，這取決於國家「在市場空間、經濟制度、政府政策、人口素質、基礎設施、社會環境、文化氛圍等方面滿足各國投資者需要的能力，即取決於這個國家在投資環境上對全球企業(生產要素)的吸引力」。因此，制度競爭就意味着各國爭相滿足全球企業要求的競爭。

應該說，這一分析道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本質特徵，即跨國公司主宰全球。各國爭相滿足跨國公司的需

今天國際經濟競爭的海洋中已經形成了從浮游生物、蝦米小魚到鯊魚、鯨魚的龐大食物鏈與鯊魚、鯨魚型跨國公司相比，中國的企業充其量只能算黃魚、帶魚、金槍魚。一旦把有保護作用鐵絲網完全撤除，很難設想黃魚不成為鯊魚的美餐佳餚。

韓朝華居然把跨國公司主宰各國的現實說成「企業將不再是國際經濟競爭的主角」。我不知道主角一詞究竟該怎樣理解？在嫖客和妓女的關係中，究竟誰是主角誰是配角？如果說妓女怎樣為嫖客提供良好的服務，妓女就成了競爭的主角，那韓朝華的論述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要，降低稅收，提供基礎設施，保障跨國公司收益的自由匯出，資本自由流動。最近有一個生動例子說明了跨國公司怎樣主宰全球，那就是1999年3月中旬德國財政部長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的辭職。拉方丹從1995年起就擔任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是黨內核心人物。1998年社民黨大選成功，組成紅綠聯盟政府，他擔任財長一職，但實際上卻是本屆德國政府中最具權威的人物。拉方丹的經濟思想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的，在德國經濟面臨衰退的情況下，他主張擴大內需，提高社會保障標準，降低失業率，減輕低收入者的賦稅負擔，增加他們的實際收入，以刺激消費。同時，為彌補稅收減少的損失而增加高收入者和大企業的稅負等。但是，這一系列主張卻遭到德國經濟界強烈反對。20家跨國公司的老闆聯合警告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政府，在歐洲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拉方丹的經濟政策意味着增加勞動力成本，減少利潤，從而削弱他們的競爭力。如果繼續執行這種政策，他們將考慮把總部和工廠遷出德國，這樣政府不但不能降低失業率，反而會使之上升。這20家公司中有西門子、漢莎航空公司等著名跨國公司，出面說話的是德國安聯保險集團(Allianz)的首席執行官璦利(Henning Schulte-Noelle)。就這樣，拉方丹因為不能為企業提供更好的投資環境而被迫辭職。

但是，奇怪的是，韓朝華文居然把跨國公司主宰各國的現實說成「企業將不再是國際經濟競爭的主角」。我不知道主角一詞究竟該怎樣理解？在嫖客和妓女的關係中，究竟誰是主角誰是配角？如果說妓女怎樣為嫖客提供良好的服務，怎樣提高素質，降低收

費，妓女就成了競爭的主角，那韓朝華的論述應該是可以成立的。其實問題正在這裏。在全球化時代，跨國公司主宰全球經濟，剝奪各國公民的民主權利(收稅權就是公民的民主權利之一)，使國家淪落為為跨國公司服務的妓院，進而造成財富進一步向兩極分化，成為各國經濟和政治動盪的根源。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其實就是跨國資本流動的結果。80年代後期，當日元升值，日本產業大量轉移到東南亞時，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地皮升值，勞動力緊缺，經濟迅速繁榮起來。然而，經濟繁榮、勞動力緊缺必然意味着工資上漲。對泰國老百姓來說，這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對外資來說，卻是成本的上升。隨着中國、越南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歡迎投資，隨着中國人民幣大幅度貶值(1994年貶值約60%)，泰國老百姓就開始入不敷出了。他們開始靠股票、房地產市場吸引的投機性資本來彌補貿易上的赤字，但投機資本賺了錢以後也揚長而去，於是泰銖、印尼盾等一如水銀瀉地。仍以前例，當資本流入一國時，恰如大批嫖客光臨某一妓院，妓院生意興旺，妓女供不應求，價格上揚。上揚到一定程度時，嫖客發現另一處妓院收費低廉，服務良好，於是又蜂擁而去，使此地妓院的服務(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大量閒置，妓女連同老鴿的生活水平都大大下降。

這意味着，所謂全球化下的「制度競爭」實際上是國家作為跨國公司的打工者的競爭。當然，有工可打總比失業好，就像拉丁美洲比非洲好，中國比泰國、印尼好一樣。中國至少還是一個國際打工者，外資還在流入。然而，韓朝華的理想可能還是更遠大

一些，他可能希望中國通過制度競爭「成為優勢企業薈萃、經濟資源富集的增長『寶地』」。如果世界500強真有200家總部落戶中國，連同其一流的研發機構和人員，連同其年薪百萬千萬美元的總部人員，至少可以使中國的房地產升值，高薪職位增多，教育機構經費充足，當然也不失為一種大體過得去的結果。但是，站在跨國公司的角度看，這種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為投資環境中最重要的是安全環境。如果跨國公司在當地獲得了高額壟斷利潤，但卻由於赤貧者暴亂而宣布將其資產收歸國有，那麼無論有多少稅收減免，無論政府政策如何透明，無論當地人員素質如何價廉物美，都將給跨國公司造成難言的損失。由於全球化推進了兩極分化，這種危險無疑是增加了。不僅如此，即使一國國內政治不出大亂，但遭到鄰國侵略，由鄰國宣布沒收其資產，這同樣是不可容忍的。由此可知，跨國公司的總部恐怕很難遷出發達國家，像美國這樣的由國家導彈防禦系統(NMD)保護的國家才是跨國公司可靠的家園。中國固然可以像韓朝華所設想的那樣，巧打扮，勤梳妝，學會做一應家務和推拿按摩，建立完善的制度，日夜恭候跨國公司的寵幸，但這恐怕也只能是像泰國、印尼那樣成就一夜之歡，而難以名媒正娶，登堂入室。

三 腐敗才是中國一切問題的根子

如果說韓朝華的制度迷戀頗有些一廂情願的話，他對國有企業興廢存

亡分析的現實感就強一些。他告訴讀者：「大批國有企業陷入經營困境已成為當前國內所有經濟難題的焦點，如果不完成國有企業的制度改革」，那就會影響經濟增長，引發嚴重的金融危機，給財政帶來沉重負擔，失業問題難以解決，並影響社會的穩定等。這裏，我們並沒有多少分歧。問題在於，國有企業何以敗落到今天這般田地？他的回答是缺乏真正的產權改革：「不論人們在主觀認識上是否了解和接受這種產權轉移的要求，追求經濟效率的基本動因都在推動着國有企業的產權不可逆轉地從政府轉向民間。」「這不是基於意識形態的選擇，而是經濟理性在實際生活中發揮作用的結果。」

甚麼是經濟理性在實際生活中發揮作用？對於企業來說，就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對於個人來說，就是個人收益最大化；對於政府和國有企業官員來說，就是以權換錢，化公為私，就是腐敗。也就是說，按照韓朝華文章自身的邏輯，翻譯成普通人聽得懂得的語言，其實是「腐敗才是中國一切問題的根子」。

既然如此，形成有效的懲治和防止腐敗的機制，才應該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是韓朝華恐怕認為，腐敗是公有制條件下經濟理性的必然產物，不應該責怪官員腐敗，而應該拋棄公有制。而且正是由於官員腐敗，「在中國的國有部門中形成了制度改革成本小於制度維持成本的局面，改產權比不改產權更有利了。這實在是值得舉雙手歡迎的事，它應被視為中國經濟改革所取得的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階段性成果」。這種論調我們耳熟能詳，只要能實現新體制，不

按照韓朝華文章的邏輯，「腐敗才是中國一切問題的根子」。既然如此，形成有效的懲治和防止腐敗的機制，才應該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是韓朝華恐怕認為，腐敗是公有制條件下經濟理性的必然產物，不應該責怪官員腐敗，而應該拋棄公有制。

面對國內腐敗成風、國外強敵壓境的嚴峻形勢，我感到連呼吸都困難。如果說勉強要在批評之後給出盡可能簡單的建設性建議的話，那我主張「對內開放，對外保護」。對內開放意味着制度變革；對外保護意味着更嚴格的限制投機性資本的出入。作為國際經濟競爭中的弱者，我只能設想中國需要打一場持久戰。

管是騙出來的，還是腐敗出來的，都值得「舉雙手歡迎」。

但是，我很難想像一個腐敗出來的新體制會成為中國走向新生的起點。如果國有企業和政府的官員利用腐敗得來的巨額財富，又在腐敗中轉化為私有化後的企業控股權，如果這一切都被韓朝華一類的文章論證成中國的進步，我想社會公平感將會蕩然無存，「去偷，去搶，去殺人，去放火」將成為社會的共識。果如此，則韓朝華最熱衷的「制度競爭」恐怕也會無從談起。甚至，正如我們已經在中國各地及東歐、俄羅斯等地看到的那樣，由於社會的精英層是靠腐敗來獲得財富的，他們對經營好私有化後的企業的興趣並不大。他們會繼續玩包裝企業和買賣企業的遊戲，將其個人財富最大化。而這對社會來說則意味着生產資源的災難性浪費，也意味着經濟衰退，銀行破產，財政巨額赤字，通貨惡性膨脹。

四 對內開放，對外保護

韓朝華一再指出：「如果中國將應對世貿挑戰的重點置於由政府組建企業『航空母艦』上，中國有可能再次犯方向性的錯誤。」這我完全同意。然而，同樣將犯方向性錯誤的是，認為只要改革制度就可以應對世貿的挑戰。

80年代國門初開，學術界把制度變革當作解決中國問題的萬應靈方，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轉眼間20年過去了，如果我們還停留在「一……就靈」的直線型思維方式上，恐怕不是天真幼稚，就是別有用心

了。世界是複雜的，中國是複雜的，複雜的問題並不存在一個簡單的答案。我們當然要改革，問題是怎樣改革，是公平的還是腐敗的；我們當然要開放，問題是開放到甚麼程度，是否要以中國仍然弱小的民族工業為代價；我們當然要經濟增長，問題是增長是否與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正相關；我們當然要加入世貿，問題是以甚麼樣的條件，能否給中國經濟以成長的空間，我們是否只能等待跨國公司的寵幸。

面對國內腐敗成風、國外強敵壓境的嚴峻形勢，我感到連呼吸都困難。如果說勉強要在批評之後給出盡可能簡單的建設性建議的話，那我主張「對內開放，對外保護」。對內開放意味着制度變革，也意味着給變革後的企業在競爭中成長為航空母艦的機會；對外保護意味着拉起渤海灣口的鐵絲網，小魚小蝦能自由出入，鯊魚、鯨魚需要瘦身進入，而投機性資本的出入則受到更嚴格的限制。作為國際經濟競爭中的弱者，我只能設想中國需要打一場國際經濟競爭的持久戰。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允許展開公共政策辯論，依靠辯論來重新凝聚人心，聚集起持久戰所需要的精神力量。這正是我在《碰撞——全球化陷阱與中國現實選擇》中的主張。

韓德強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系副研究員。